

“两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范式创新的三重维度

梁德友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本质上是“两个结合”引领和推动的一场深刻“知识革命”。认知层面,“两个结合”以“实践优位”生成植根中国实践的本土化标识性概念体系,并依托“文明基体”涵养独特认知框架,为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自主生成奠定认知前提;价值层面,“两个结合”锚定“人民性”价值准则,以“新天下观”拓展知识生产的全球视野,确立“人民—天下”复合伦理尺度,筑牢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的价值根基;话语层面,“两个结合”推动话语范式从“依附性表述”到“自主性叙事”的范式跃迁,实现话语来源从“译介—回应”向“实践—生成”转向、话语资源从“传统—历史”向“当代—创构”转化、话语框架从“依附—移植”向“本土—自立”转变。“两个结合”引领的这一知识建构逻辑,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知识垄断,为自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而且为全球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探索贡献了可资借鉴的知识参照和中国智慧。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两个结合;范式

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6)06-0019-0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1]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议题,也是中国回应全球性现代化发展困惑、贡献中国方案的知识基础。

伴随西方现代化的全球扩张,其相关知识逐渐固化成为一种具有支配性的霸权范式。长期以来,以西方为模板、以“现代化=西方化”为隐性公理的知识体系,正扮演着这种范式角色。此范式设定的现代化模式、道路、制度乃至路径等一系列符号、价值,将西方地方性经验演绎为现代化的普遍性知识。而后发国家则被迫在这场“文字游戏”中沦为西方知识的试验场、数据采集地与案例提供方,无奈深陷

“失语、失声、失踪的知识困境”^[2]。近代以降,西学东渐,我国现代性知识生产亦长期卷入西方现代化范例而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3]的问题。然而,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4]的文明特质与实践创新已突破并超前于旧有范式的理论边界。因此,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绝非简单的知识缝补,而是一场关乎知识生产世界观与方法论根基的范式革命。而推动这一范式创新的核心引擎与实现路径,正是“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为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阐释和传播提供了革命性动力和方法论。

这一问题亦引起了学界关注,并已形成若干主

收稿日期: 2026-03-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化自主性发展的中国理念与实践路向研究”(24AKS017)。

作者简介: 梁德友,男,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4)。

要路向:其一,聚焦“两个结合”如何为自主知识生产提供核心动力与根本方法^[5];其二,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核心范畴、理论框架与学科范式的建构^[6];其三,阐发“两个结合”对奠定知识体系精神独立性与文化主体性的深层次文明根基价值^[7];其四,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的叙事传播与话语权构建的逻辑路向^[8],等等。既有研究在动力、体系、文明、话语等维度为后学夯实了学理基础,拓展了学术视野。但不足之处在于,多数研究或将“两个结合”与“知识体系建构”作为相对独立的论域进行关联性论证,或从某一具体学科切入探讨其价值意义,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主体性”这一关涉知识生产认知前提、价值立场与话语权力的元理论问题,如何通过“两个结合”得以系统性重塑,尚缺乏整合性分析框架。换言之,现有研究在深刻阐释“两个结合”之“然”方面成果丰硕,但在深入揭示其如何驱动现代化知识生产从“常规科学”阶段的谜题破解转向范式革命的“所以然”方面,仍有深化的必要和空间。因此,从范式转化角度,剖析“两个结合”如何通过“认知重塑—价值重设—话语重构”的逻辑路径,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式创新,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深化“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意义,而且能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新的学理支撑与知识启示。

一、认知重塑:奠定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根基

任何知识体系的生成,都始于特定认知前提的塑造。“两个结合”重塑知识主体的认知坐标,通过锚定实践本位、激活文明基因,实现对知识生产认知逻辑的系统性重塑,奠定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生成根基。

(一)以“实践优位”生成本土化的标识性概念体系

相较于西方知识体系从既有理论框架出发裁剪中国实践的路径,“第一个结合”确立了实践在知识生产中的优先位置,主张从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提炼具有本土化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这一概念体系承载着中国实践的独特经验,标识了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知识的符号边界,催生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新的符号系统。

自18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台蒸汽机冒出第一缕黑烟,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现代化,便披着西式外衣在世界各地肆虐扩张。“现代化=西方化”“现代化=资本化”等认知符号也从此成为后发国家建构现代化知识的“前理解”^[9]。同样,在中国百年沧桑的现代化道路求索中,这种“前理解”也作为标识性符号在一段时间内被国内知识界奉为主臬。结果可想而知,近代以降,中国知识生产伴随西方理论起舞,深陷范式依附的认知困境而难以自拔。“第一个结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主体认知的彻底转向,为新的符号概括提供了方法论遵循。事实上,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0]这一观点强调了要将“实践”作为知识生成、检验与发展的终极场域与评价标准。从哲学角度看,虽然任何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前理解”,但“第一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创造性地应用于知识生产场域,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实践”“中国实际”“中国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的生成根基。这一原则要求知识生产者必须深入中国现代化鲜活、生动的具体实际,从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的实践中凝练自己的概念、框架、范畴,而不是采取“拿来主义”,不假思索地套用西方范式。进言之,这种认识论重塑,直接催生了知识主体从中国大地提炼原创性概念与理论模式的范式自觉,并以此生成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新的符号系统。事实上,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一系列标识性概念的诞生与建构,已经清晰展现了这一生成逻辑。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康社会”“新发展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以及“新质生产力”等概念,无一不是植根于中国土壤、回应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的原创性符号概括。这些新的符号以其强烈的实践品格和鲜明中国特色,精准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知识图景,形成了理解和阅读中国现代化的“认知密码”。

所以,“第一个结合”确立的“实践优位”,使中国式现代化知识生产不再依赖于西方的“概念拐杖”,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范式符号,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

(二)以“文明基体”涵养独具特色的认知框架

任何知识体系的背后,都蕴含着特定文明滋养的认知逻辑和意义框架,这是知识体系扎根生长的文化土壤,也是知识生产之所以具有自主性的文化

依托。“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打破了以往对西方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具有本土化文明特质的新“形而上学范式”^[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我们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系统提炼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论和新实践,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2]49}作为积淀数千年的文明基体,中华文明拥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礼乐文明,‘近悦远来、万方辐辏’的大国气象,‘星汉灿烂、光焰万丈’的千古文章”^{[12]43}。这一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了文明基因,提供了崭新的“形而上学范式”。例如,“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整体宇宙观,强调物我同构、万物平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这种宇宙观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建构不仅要关注人类自身的发展,更要立足绿色发展,树立更为系统、整体、可持续的认知理念;又如,“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与秩序观,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零和博弈思维与霸权逻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遵循,也为破解当前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知识方案;再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革故鼎新”“与时偕行”的变革理念,“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等等,皆从不同维度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了千年优秀文明基因,形成了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形而上学范式。

因此,“第二个结合”不是简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知识生产的“材料”纳入既有框架,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度激活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脉络,从文明根脉处生长出适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认知逻辑与价值坐标,让自主知识体系真正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拥有区别于西方知识体系的独特精神标识与意义建构。

(三) 认知范式的差异性和知识生产的主体性确立

“两个结合”分别从符号生成与本体认知层面,

实现了对传统认知范式的系统性重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知识生产摆脱西方认知框架束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认知范式。这种独特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认知根基的文明特质,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生产的主体性。

一方面,认知逻辑上,“两个结合”推动的认知范式以“实践优位”与“文明基体”为核心特征,与西方“理论优位”和“西方中心”的认知前提形成鲜明对照。西方现代化知识体系惯于以西方知识范式为逻辑,构建具有普适性的模型框架,并以此来裁剪丰富多样的他国实践,其认知路径是从“理论”到“实践”,把他国现代化经验套入预设的理论框架,用既定逻辑消解非西方实践的独特性,其本质是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的知识霸权。而“两个结合”所孕育的新认知范式,则强调从中国具体国情和自身特殊性出发,通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和理论的持续提炼,形成对现代化规律的一般性认识,其认知路径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辩证过程。认知逻辑的转变,使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能够深刻把握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同时又能以此“特殊性”为根基,打破西方现代化迷思,为人类探索现代化新模式贡献中国智慧。例如,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往往将“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视为现代化标配,并将此作为“普世良方”向全球推广。而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则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出发,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认知框架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建构的主体性自觉。

另一方面,问题意识上,新范式聚焦于中国现代化场域的“中国问题”,而非西方议题的“应声虫”。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3]西方现代化知识体系的问题意识,大多源自财产私有、资本优先等语境下的现代性困境和挑战,其分析框架和解题方式往往带有浓重的西方口音和西方烙印。“两个结合”奠基的认知新范式则以解决中国现代化自身实际问题为认知起点和导向,其重要使命是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知识支撑。例如,如何在一个超大规模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如何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物质富裕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在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中促进生态文明发展,如何

在风云激荡的国际环境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等。中国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独特的问题谱系和知识生长点。

可见,“两个结合”奠基的新认知范式,其核心价值在于知识体系的主体性确立。中国式现代化不再是西方知识的被动接纳者、盲目模仿者或简单的本土化改良者,而是扎根中国大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独立自主地观察、剖析和解决中国自己问题的文明新形态。知识生产主体性的确立,让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理论、贡献自己的知识,从而打破长期以来现代化知识的西方独家解释权和概念定义权,为解决人类共同发展难题提供来自中国的原创性认知框架和知识范例。

二、价值重设:确立“人民一天下”的复合伦理标尺

与所有的知识生产一样,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并非价值中立的纯粹知识生产活动,其建构过程始终内嵌特定的伦理立场与价值追求。“两个结合”在引领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中,既锚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又拓展出胸怀天下的全球视野,凝练出“人民一天下”的复合伦理尺度,为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确立了新的价值边界。

(一) 锚定以“人民性”为核心的知识生产准则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解放的人民理论^[14]。“第一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深度融合,锚定“人民性”知识伦理,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民性”价值坐标。

“人民性”价值承诺绝非抽象的政治宣示,而是深嵌知识生产全过程的伦理准则与实践逻辑。这要求知识生产者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回答人民之问,构建人民需要的自主知识体系。即,其问题意识必须以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导向,聚焦人民急难愁盼等现实问题;其知识生产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主体性和首创精神;其知识评价必须以是否增进人民福祉、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准绳。因此,人民性价值导向,既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资本增殖的知识商品化逻辑,又与以“价值中立”掩盖特定意识形态预设的西方学术幻象划清界限。具而言之,一是知识伦理出发点的转向。从以“抽象的个体理性”或“资本逻辑”为隐秘

起点,转向以“现实的人”为根本出发点。无论是启蒙时期的理性人预设,还是现代性知识的资本逻辑,西方现代化大多将知识生产与广大人民群众割裂开来而服务于特定群体,导致知识生产沦为少数人的“文字游戏”。而以“人民性”为核心的知识伦理,则将“人民美好生活”作为知识生产的原初出发点。在这里,知识生产不再是知识精英头脑中的抽象思辨,而是扎根实践土壤的“问题导向式”探索——知识生长点与人民需求的现实堵点、痛点、难点形成直接呼应。二是知识生产关系的重构。“人民性”价值导向打破单向度的传统知识传递模式,强调知识生产主体的“复合性”。其间存在诸多角色、地位、作用有所不同的构建主体,正是这些主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作用,不断塑造与该实践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因此,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既非少数专家学者书斋里的“坐而论道”,也不是部分群体价值无涉的“纯粹理性”,而是深嵌民族富强、人民幸福实践过程的人民集体性书写。这一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其生产实践、生活智慧、精神探索,汇成中国式现代化知识生产的源头活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源自于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15]。三是知识生产者精神气质与价值追求的塑造。知识生产者将个人学术追求与人民需要深度捆绑,坚定为人民做学问。“人民性”价值导向要求知识生产主体必须“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12]50-51}。这意味着知识生产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做“为民鼓与呼”的人民理论家。其知识生产不再局限于西方学术热点或抽象理论推演,而是向下扎根、向上求索,积极回应民生问题,通过知识创新为人民排忧解难,进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知识创造。

综上,人民性的价值导向,不仅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使知识生产者与人民群众形成了休戚与共的知识命运共同体,全面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知识生产准则。

(二) 确立以“新天下观”为视野的知识生产伦理

“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同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仁者爱人的天下情怀相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

自主知识体系确立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内容的“新天下观”。“新天下观”既非对过去天朝上国朝贡体系的复古与留恋,更不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亦步亦趋,而是超越西方现代化民族国家本位、零和博弈思维、国强必霸逻辑等狭隘国际观的一种新型全球伦理视野。

“新天下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天下为视野,以人类为中心,强调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伦理主张认为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都有走自己道路的选择权。“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2]104}“新天下观”全球伦理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视野迈向“兼济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知识关怀体现了“魂脉”与“根脉”的贯通、“古”与“今”的赓续,必然引发人类社会对“古今中西之争”^[16]的深刻反思和重新审视。“鼓噪‘文明优越’、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是对其他文明的不尊重,只会阻碍人类文明进步。”^{[12]103}因此,“新天下观”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知识生产强调在尊重道路选择权和文明自决权基础上,通过互学互鉴、交流对话来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知识与理论范式,为人类贡献本民族的独特知识。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超越个别,形成“普遍”知识,而且要在普遍中彰显自身独特文明基因,建构“各国文明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12]103}的自主知识体系,凸显其引领全球知识创新的伦理愿景。换言之,“新天下观”使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世界眼光与人类情怀——其追求的不是个别国家的“一枝独秀”,而是世界各国的“百花齐放”;不是文化的“优劣之分”,而是文明的“交流互鉴”。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回答中国之问,也要回应世界之问;不仅要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成功逻辑,也要致力于从中国实践和东方智慧中提炼造福人类的理念、方案与知识。例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已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再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路精神,为推动人类文明朝着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贡献了东方智慧,彰显了“新天下观”所蕴含的开放、包容与共享的伦理追求。

由此,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更具备了关照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历史意义,从而在全球知识版图中确立起新的价值坐标和伦理担当。

(三)以“人民—天下”复合尺度筑牢价值根基

“人民性”价值导向与“新天下观”全球伦理视野,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人民—天下”复合价值尺度。这一价值尺度蕴含的伦理关怀和文明视野与西方现代化知识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知识生产的独特价值根基。

首先,这种独特性体现在知识生产的价值排序上。西方现代性知识范式虽也不乏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但其价值排序往往难以摆脱资本逻辑的深层制约,少数人的利益与资本增殖成为知识生产的不变价值准则。而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人民—天下”的复合价值尺度,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置于价值序列的首要位置。这种价值排序的颠覆性变革,使现代化知识不再是西方资本逻辑的“阐释者”及其合法性的“辩护者”,而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社会整体进步的思想武器,与西方知识范式“见物不见人”的价值取向形成鲜明对比。其次,这种独特性体现在认知框架的差异上。西方现代性知识范式在处理个体与群体、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时,常常陷入二元对立的认知困境——要么以个体本位消解集体价值,要么以民族国家利益凌驾于全球正义之上。而“人民—天下”复合价值尺度则内嵌“个体—共同体—人类”的辩证统一思维——既尊重个体的合理诉求,也强调共同体利益;既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权益,又将自身发展置于休戚与共的全球视野中。这种系统性、整体性认知框架,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彻底拉开了距离。最后,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实践路径的不同。西方现代化知识实践,往往伴随知识殖民、文化霸权等不平等伦理秩序的建构,其知识输出常常附加意识形态渗透与利益收割的隐性目的。而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所蕴含的“人民—天下”价值尺度,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7],主张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全球伦理。其知识实践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2]104},与西方霸权的扩张性、掠夺性形成鲜明的范式反差。

简言之,“两个结合”所确立的“人民—天下”复合价值尺度,使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在价值

立场、伦理关怀和目标导向上均呈现出与西方知识范式的“不可通约性”^[18]。这种不可通约性恰恰是知识生产者主体独立与伦理觉醒的标志,彰显了中国现代化知识体系的独特价值立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原创性知识贡献。

三、话语重构:形成“自主性叙事”的话语范式

“两个结合”通过系统性重塑话语的生成来源、文化资源与意义框架,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话语对现代化知识叙事的垄断,重掌了话语表达的定义权、阐释权与叙事权,推动话语来源、话语资源与话语框架的根本性转变,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性叙事的话语范式。

(一) 话语来源:从“译介—回应”向“实践—生成”转向

“第一个结合”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知识生产摆脱了话语移植、嫁接的被动态势,推动话语体系从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回应”,转向对自身实践“总结—阐释”乃至“原创—引领”的话语模式,实现了自身话语来源与生成方式的转变。

近代救亡图存语境下,中国现代化的话语叙事曾一度“言必称欧美”——西方译介成为话语的主要生成模式。但中国式现代化并非西方理论在中国大地的简单应用与线性展开,而是“既借鉴吸收一般意义现代化的优秀成果,又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地域特点和文化禀赋个性的现代化”^[19]。其“规模性、共享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与和平性”^[20]的文明特性和波澜壮阔的并联式叠加发展,蕴含着西方既有理论无法完全涵盖的“实践理性”和“默会知识”^[21]。实践的独特性与理论的丰富性,迫切需要建构与之相匹配的原创性话语体系。“第一个结合”正是回应这一实践呼唤的方法论自觉。它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作为话语生成的“元问题”来源,强调从鲜活的改革实践、发展经验、基层探索中提炼概念、建构理论、开展叙事。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不再是简单地从西方理论库寻找“标准答案”或“分析框架”,也不是在西方话语的“问题视域”和“概念体系”内进行被动回应与辩护,而是以中国实践为文本、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发展为语料,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严谨的理论提炼和系统的话语建构。为此,话语生产者必须俯下身去、沉到一线,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进行系统

性总结提炼、抽象升华,使其从具体的建设经验、默会知识上升为既可意会又可言传、既可迁移又可共情的理论话语和学术概念范例系统。由此,一系列源于中国实践、标识中国经验、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概念与理论表述应运而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话语体系的内核与典范。例如,“小康社会”精准概括了中国从“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阶梯式发展目标与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性命名了人类经济史上一种融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效率的新型经济体制;“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广泛、真实、管用地贯穿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环节的完整制度链条与实践;“新质生产力”则前瞻性把握了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生产力质态,等等。这种“实践—生成”的话语来源与生成方式,让中国式现代化自主话语体系得以根植中国大地,确立自己的话语主场,彻底改变了“西方出题、中国作答”的被动局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知识话语的主体性建构。

话语来源与生成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话语体系从此告别概念搬运与理论移植的路径依赖,实现了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再到“自己讲”的话语质变。以此为契机,中国式现代化以自身实践为“元叙事”锻造标识性概念,实现话语来源从被动“译介—回应”到主动“实践—生成”的转向。

(二) 话语资源:从“传统—历史”向“当代—创构”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22]“第二个结合”推开了优秀传统文化大门,激活了五千多年积淀的思想智慧,为知识话语的生产提供了丰富资源与精神内核,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资源从“传统—历史”向“当代—创构”转化。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23]形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博大精深、取之不竭的话语资源富矿。“第二个结合”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蕴含无尽智慧的宝库,使传统文化不再是故纸堆里的尘封故事和博物馆中的陈列展品,而是参与现代意义建构、塑造话语独特气质的活性基因。这种转化既非简单的“旧瓶装新酒”或术语嫁接,也绝非直接的

“古语今用”“寻章摘句”,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批判精神与实践精神的烛照,激活古老民族话语的现代性价值,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联相通,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话语”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高度契合,使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话语”获得了传统文化的强力支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与开拓创新、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相合相映,为中国式现代化“改革话语”注入了古老基因;“革故鼎新”的变革意识与改革开放、守正创新的伟大实践相互统一,为中国式现代化“创新话语”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理念同频共振,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话语”提供了东方哲学基础;“亲仁善邻”“睦邻友好”的邦交之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主张遥相呼应,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平话语”奠定了文明底蕴;“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话语”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内涵;等等。这种贯通古今的现代性激活,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更加彰显出思想的深度、历史的厚度和人文的温度,从而具有更加鲜明的文化辨识度与更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质言之,传统话语的现代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文明厚度与文化自信,而且使其在世界文明对话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强大的传播力。

(三) 话语框架:从“依附—移植”向“本土—自立”转变

长期以来,西方全球话语体系“深藏着基于西方特殊历史变迁轨迹而形成的碎片化与割裂化的历史视角、线性史观与历史目的论的史观基础,以及文明优越论的叙事底色”^[24]。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往往被置于“冲击—反应”^[25]等叙事框架中被表述、被评判,常常被迫陷入“被定义”的话语困境。

“两个结合”孕育的范式创新,内在蕴含着对西方元叙事的深刻解构与主体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返回自身的实践土壤与文明根脉,创建全新的更具历史包容性与现实解释力的叙事框架。这一框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从西方框架的依附与移植,转向基于自身历史逻辑、文化基因与实践经验的“主体性原创叙事”。进言之,“两个结合”激活了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焕新了中华文明的智慧精华,推动中国完成了波澜壮阔的“旧邦新命”式的现代转型。这一转型不仅引领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而且实现了话语框架从“依附—移植”向“本土—自立”的范式转变:一是“本土—自立”彰显了话语的“实践创造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是任何现成理论或话语的翻版,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中国语言智慧。二是“本土—自立”赓续了话语的“历史连续性”。“本土—自立”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自身文明传统的全盘否定与割裂,而是在扬弃传统文明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两个结合”得到扬弃和升华,并在此基础上滋养中国发展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转型充满了文明韧性与主体自觉。三是“本土—自立”蕴含着“文明开放性”与“未来导向性”。独立自主的本土化叙事绝非封闭排他的话语体系,而是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兼容并蓄。这一话语叙事立足中国、面向未来,与世界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话语智慧。

一言以蔽之,话语框架的重构与叙事主权的重掌,不仅使中国式现代化摆脱了西方叙事的窠臼与束缚,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性阐释和话语支撑,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为理解现代化多元可能、重塑世界现代化话语格局注入了清晰、强劲的中国声音。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兼具现代化“共色”、社会主义“底色”与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深厚而独特的文明意蕴^[26]。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其深层逻辑与核心机制并非细枝末节的修补或内容上的机械模仿,而是由“两个结合”引领和驱动的一场深刻“知识革命”。认知重塑、价值重设、话语重构,三重逻辑彼此支撑、相互贯通,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实现范式跃升与理论原创。“两个结合”引领的这一知识建构逻辑,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知识垄断,为自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而且为全球后发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构建自身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智慧,为推动全球知识生产多元发展、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具有主体性

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更好回答中国之问 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N].光明日报,2026-05-18(1).
- [2] 沈江平,王嵩.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着力点[J].云南社会科学,2026(1):2-10.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6.
- [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23.
- [5] 孙乐强.“两个结合”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J].南京社会科学,2023(7):10-18.
- [6] 沈江平,武磊.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与推进路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0-29.
- [7] 田鹏颖.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J].思想理论教育,2024(5):4-11.
- [8] 张世昌.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学理化考量[J].重庆社会科学,2026(4):28-37.
- [9]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78.
-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2.
- [11] 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M]//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965年伦敦国际科学哲学会议论文汇编第四卷.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83.
- [1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4.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

290.

- [14]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 [15]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N].人民日报,2023-07-02(1).
- [16]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1.
- [17]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 [18]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4版[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4.
- [19] 梁德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与世界历史意义[J].中州学刊,2024(3):13-20.
- [20] 唐未兵.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先进本质和中国特性:兼论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9):32-42.
- [21] 波兰尼.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M].徐陶,许泽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28.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285.
- [2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M].2023:193.
- [24] 孙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的哲学基础: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J].哲学研究,2025(12):14-27.
- [25]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132.
- [26] 马俊峰,马小飞.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意蕴的三重维度探赜[J].学习论坛,2026(1):102-110.

The Triple Logic of Paradigm Innovation of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Guided by the “Two Combinations”

Liang Deyou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essentially a profound “knowledge revolution” led and driven by the “Two Combinations”. At the cognitive level, the “Two Combinations” generate a localized symbolic conceptual system rooted in Chinese practice based on the “practice priority” principle, and cultivate a unique cognitive framework relying on the “civilization matrix”, which lays a cognitive foundation for the independent formation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t the value level, the “Two Combinations” anchor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criterion, expand the global vis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via a new worldview, establish a composite ethical standard integrating people and the world, and consolidate the value foundation of autonomous knowledge for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t the discourse level, the “Two Combinations” facilitate a paradigm shift of discourse from “dependent expression” to “autonomous narrative”. This shift realizes three transformations: the source of discourse changes from “translation and response” to “practical generation”, discourse resources shift from “tradition and history” to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and discourse frameworks evolve from “dependence and transplantation” to “local self-reliance”.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logic guided by the “Two Combinations” not only breaks the Western monopoly on modernization knowledge and provides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ndepend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ut also delivers referential knowledge and Chinese wisdom for latecomer countries worldwide to explore their own modernization paths.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Two Combinations; paradigm

责任编辑:筱月